

XIFANG MINZHU ZENME KAN

# 西方民主 怎么看

詹得雄 ◎著

关于民主的札记

关于自由的札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

西方对民主的反思

西方民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有普世价值观吗

谈谈互联网与民主

有理由自信 有必要从容

人 民 大 版 社

XIFANG MINZHU ZENME KAN

西方民主  
怎么看

詹得雄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侯俊智  
责任编辑:侯俊智 吴广庆  
装帧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语丝设计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民主怎么看/詹得雄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  
ISBN 978 - 7 - 01 - 015681 - 1

I . ①西… II . ①詹… III . ①民主-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D5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1261 号

### 西方民主怎么看

XIFANG MINZHU ZENME KAN

詹得雄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4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681 - 1 定价: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言

## 我看民主

近几年来，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文章，在结集出版之际，我想回顾一下自己的认识过程，从而试图理清我对民主的一些看法。民主是一个过程，对它的研究、讨论和实践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算不上什么学者。我的认识只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肯定不够全面。如果我的看法能给人一点点启发，也就满足了。

### 一、题解

先想对书名《西方民主怎么看》说几句。不要误会，以为我完全反对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是欧美国家几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制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弊端，尤其近十多年来可以说弊病毕现，有目共睹。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有它的合理性。我不但不反对西方国家在自己国内实践并试图完善这种制度，而且一直隐隐担心，怕他们哪天搞不下去，爆发某种不测事件，从而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历史上这种

事情是发生过的，希特勒用“民主”的手段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更使我们难忘这段历史。

民主理念已经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现在几乎没有不要民主。因此，我认为目前谈民主，主要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存在什么最佳民主，而是要看对你的国家合适不合适。如果要想现在就在我国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和繁荣昌盛，这不是糊涂，就是有意误导，我要响亮地说：“不！这样不行！”为什么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认识过程和思考。

## 二、在印度所见所闻

我是 1979 年去印度做新闻工作的，那时中国刚刚从一场灾难中走出来，改革开放也才起步，正迫不及待地希望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看可以向印度学什么。我看到了印度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农户加合作社的牛奶生产）和信息革命等，都及时地写了一些介绍文章。但涉及印度的政治体制，我感到很困惑。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盖的圆型议会大厦里，整天吵吵闹闹，相互指责。明明急待通过的提案，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各党各派都声称自己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的贫穷却在世界上出了名。

在我去印度前几年，印度发生了一场危机，以英迪拉·甘

地夫人为首的国大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大批反对党领导人被捕，大选也被取消。当时，印度外无战争，内无大的动乱，为什么要宣布“紧急状态”呢？原因是反对党闹得实在太厉害，议会里什么事都办不成，而英·甘地著名的口号“赶走贫穷！”只是喊喊，采取不了实际行动。于是她想干脆踢开议会来干点实事，谁料捅了马蜂窝，全国上下一片声讨，她也黯然下台了。而到了1980年年初，她又在大选中获胜上台，原因是代替她的人民党政府也没干好，老百姓也不满意。这种闹哄哄的“民主”让我看得迷迷糊糊，百思不得其解，国家可以这么治理么？老百姓得到了“民主”的好处了么？

当然，印度也自有它的长处，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在国际上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力挺，赞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后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明显加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我同印度朋友探讨过民主问题，他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有自豪感；另一方面，暗自摇头说：“我们印度民主太多了，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说中国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地图上画条线就可以了，在印度，不知要打多少官司，一拖再拖。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1945年在英国人监狱里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选举是民主政治程序中重要而不可分的一部分，是不能舍弃不用的。但选举时常暴露人类坏的一面，而很明显地不常使较好的人获得成功。神经过于敏感的人和那些不准备用粗暴、不顾一切的手段使自己出人

头地的人，都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情愿避免参加这些竞选。那么民主政治是那些厚脸叫嚣和抹煞良心迁就一切的人们的专有的猎场吗？”难怪人们批评说，选举是“煽动家的天堂，广告掮客的美梦”。

尼赫鲁讲这段话的背景是英国殖民政府 1935 年颁布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在省一级举行有限制的选举。尼赫鲁看了 10 年的选举状况，便发出了上面的感叹。那么，印度独立后为什么要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呢？我看是时势使然，当时印度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国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它的威望和力量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复杂的多元国家，于是只能用一个议会来把形形色色的力量包括进来，与其在外面动刀动枪，不如在议会里口舌相争。对于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比如贱民，平时是不被人放在眼里的，而到了投票那一天，他也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形式上与别人平等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每到选举日，很多地方颇有点节日的热闹气氛。

但是，形式和程序代替不了实质。印度议会里身背许多官司或有黑势力背景的人为数不少。我看印度报纸上的一张漫画，一位富裕的家长在训斥不成器的儿子：“你学习不好，什么都不会，以后只能去搞政治了！”

我深深感到，这种民主不能搬到中国来，袁世凯时期的国会是个证明，蒋介石时期的伪国大也是个证明。我于 1989 年第二次去印度工作，不久一位北大教授到印度访问，在回国时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这一趟印度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很

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弗朗西斯·福山于 2014 年 9 月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一书中说：“印度自从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选举制民主国家。但印度的民主就像灌香肠一样草率且不透明，仔细检查似乎不是很有吸引力。这种体制充斥腐败和惠顾；在印度 2014 年的大选中，34% 的获胜者背负着刑事案件，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犯罪。法治虽然存在，但司法程序如此缓慢和无效，以至于很多原告在其案件还没有审理就已经死亡。与中国相比，印度完全不能为其人口提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净水、电或基础教育。”

2015 年 1 月 19 日，印度总统慕克吉在演讲中激动地批评“党派政治”，认为“频繁的党派之争令政府瘫痪”。他说：“我们不能再让那种干扰有效制定政策的环境继续存在了，不能让一小撮噪音掩盖住多数人的真正意愿。”此时，正是印度人民期待“平民总理”莫迪能够做成一些事情的时候，但不知慕克吉的批评会有多大的效果。

平心而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印度曾是个完完全全的殖民地，英国人按自己的意愿已经为它设了一个套，国家虽然独立了，但却无法从这个套里走出来，要印度走别的道路也不可能。印度知名作家潘卡杰·米什拉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英国《卫报》上撰文分析了此事。他写道：“使欧洲在 19 世纪得以成功的条件——人口数量不多且成分较单一，能够将多余人口作为士兵、商人和传教士送往国外——现在在面积

大、人口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此外，正如巴西尔·戴维森在《黑人的重负：非洲与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之祸》一书中所说，帝国主义已使他们没有资源去追求西式经济发展，而且还将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强加给千百年来形成了自身切实可行的政治实体和社会结构的国家。”这就是印度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目前遇到的共同的问题。

至于说到印度的前途，我认为，他们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顽强地继续探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真诚祝愿他们尽快发展起来。中印的日子好过了，至少世界上 1/3 人口的日子就好过了，只有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了，才能说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印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可以为世界做很多事情。

### 三、西方已难自我陶醉

我从 1970 年开始，由于工作关系，每天都同外电外报打交道，观察国际形势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连续看了 45 年，虽自知学识有限，总还是看出一些道道来。其中之一就是：西方自我陶醉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正在走下坡路。

也许很多人不了解，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西方是有点恐慌的。那时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还建造了核电站，这使美国人觉得很丢脸，急起直追，直到美国宇航员在 1969 年登上月球，才算把苏联比了下去。苏联的全民福利也曾是对西方的一大挑战，西方的福利制度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

是给苏联逼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如果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作它的对立面，那么，巴尔扎克、雨果和马克·吐温笔下的“悲惨世界”将会延长很长时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屈辱的历史也将长恨绵绵无穷期。

可惜，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己出了问题，最根本的是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集团渐渐变质了，计划经济的弊病也积重难返，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而以个人主义作为伦理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二战后的废墟上获得了快速发展的良机，资本的力量一度蓬勃发展，无孔不入，凭借先进的科技，价高物美的新产品在世界上通行无阻。一台彩电可以换走一卡车的肥猪。从国外赚来的巨额利润完全可以支撑西方的高福利、高工资。西方人因而有资格以高傲的、怜悯的眼光看待穷国百姓。

大家不大注意的是，西方很少说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说自己是“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好像他们的好日子都是拜自由、民主之赐，而不是用高额利润堆积起来的。在资本当道的世界里，难道没有资本的人同有资本的人会享受同样的民主和自由吗？据路透社 2015 年 2 月 24 日柏林电：“民调发现，将近 1/3 的德国人认为，资本主义是贫穷和饥饿的根由。大多数人认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原因是“资方的政治影响力过大”。这可是路透社电，如果是新华社电，有的人可能不信，说你这是在宣传。这条电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在曾经由共产党执政的东部地区，59% 的人认为，共产主义和

社会主义理想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好理念。”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做《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类似的电讯见过不少。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往往盲目迷醉于“民主”“自由”的小夜曲，但真正了解的人一直在反思和批判，希望追求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他们的一个口号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据不少经济学家判断，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噪一时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摆脱一切约束，让会赚钱的人放手赚钱，有人赚大钱了，利润就会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地滋润整个社会，穷人也能沾点儿光。听起来很好听，但水滴却很少滴下来，顶层 1% 的人暴富，而底层的人却连正常生计都难维持。所以有人批评说，“民有、民治、民享”已变成了“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

他们还分析说，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保证资本能赚钱的社会，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特性。可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同类产品过多，搞实业的人已赚不到什么钱了，这就违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意。怎么办呢？一小撮人就想到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把本来用于搞实业的钱抽出来去做金融投机，花样繁多的、普通人莫名其妙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就是这么来的。结果是，极少数人投机成功，一夜暴富，而大多数人更加贫困。而且，这种“赌徒经济”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赚了大钱的赌徒就是“成功人士”，而勤勤恳恳用自己的

双手挣钱过日子的人，被视为“边缘人群”。

西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赌徒经济”的破产，一次次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去防止金融家破产。可是，等到危机稍有好转，这边还在用老百姓的钱注资，那边银行家们却在分发创记录的年度奖金，这才逼得有识之士气愤不平地要去“占领华尔街”。但这种正义的行动很快被“戴着丝绒手套”的手，用警棍镇压下去了。

新世纪伊始，美国在国外进行了两场耗资巨大而没有打赢的“反恐战争”，在国内又经历了金融危机，显然已力不从心，自知凭一己之力难以摆平世界，可是嘴还是很硬，口口声声还要向外强力推行“民主”。但总的来讲，大势已去，威风不再了。当然，走上了下坡路的西方，不会很快衰落，我在本书里也有篇章论及此事，就不细说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两位主编 2014 年推出新书《第四次革命》，书里说：“迄今为止，21 世纪对西方模式是极为不幸的一个世纪。”21 世纪才过去近 15 年，如何度过，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地说，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今后就看它如何演变了。

#### 四、民主理念从头看

西方理论家制造了一种迷思，好像民主发源于西方，特别是起源于希腊，而东方一直是专制、落后的。其实在远古，一个部落或一个部落集群，遇到什么大事如何决定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祈求上苍决断；另一个是由酋长召集大家聚族而议。如

果这也可以称为“民主”的话，姑且可以称作“原始民主”，这种情况哪儿都有。

希腊民主是“城邦民主”，小国寡民，所以有条件让大家一起来议决，当然没有奴隶的份儿。柏拉图（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年）观察了这种民主，并不赞成，特别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 年）在民主政权下被处死了。虽然他被处死从程序上看是“民主”的，但结果却是错误的。所以自古以来一个棘手的老问题是，投票的人都是理性的吗？英国知名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评论说：“民主政治确实是无知的军队在漆黑的夜里在平原上厮杀。民主过程选出的领袖或立法者又如何？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他们会比他们的支持者更理性？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就是以此理由反对民主，现在，最新的心理科学发现这位反民主的老人老早就说对了。”

他还介绍社会心理学家勒邦（1931 年去世）的观点说：“所以每个人不是一个自我，而是两个人，一个是正常的、‘文明的’自我，一个是异常的、‘不文明的’自我。日常生活可能是秩序井然且安定和平的，但日常生活时刻受到我们每个人被关在心里的那个‘暴民自我’的威胁。”对此，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看法。

柏拉图考察过当时的君主政体、贵族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等，觉得它们的存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有关，国家越大，越需要中央集权。柏拉图对这些制度都不满意，他的理想是：“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

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之赐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引自《第七书简》）这就是他理想的“哲学为王”论。这位老人家真的很天真，但他思考的确实是人类 2000 多年来一直苦苦探索而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大问题：国家要如何治理才能保证公正呢？人民怎样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呢？

要思考这个问题，还得先说说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对此，恩格斯有一段精辟的论断：“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0 页）

麦克里兰在介绍黑格尔时也说：“如果真正的自由能在任何时代实现，则它必须寓于国家。唯国家有能力关心普遍，而非只顾特殊。国家必须超越公民社会的自私追求，要能作此超越，国家必须尽量与公民社会分开。”

有国家必然就有专政，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国家本来是由被统治的人推选出来的，他有责也有权协调、管控矛盾，防止共同毁灭，因而必须要有暴力作为后盾，强制保持秩序。可怕的是，它会“异化”！日子长了，统治者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本来就有权统治你们！因而容易腐败，容易形成暴政。所以柏拉图期望由哲学家来做王，他们是明智

的、正义的、善良的，这样就自然导致了良政。可是，怎么样才能保证由哲学家来当王呢？柏拉图不知道，他只知道用民主选举的方法并不可靠。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必须保证一人一票，非此无所谓民主；但一人一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投票的人可能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不理性的，并不能保证总能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因此对一人一票也不能迷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五、西方民主漫漫路

在封建社会，也就是有皇帝、国王的年代，他们自称“君权神授”，是无所谓民主的，皇帝的“金口”就是法律。但也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什么事都不经商量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诗经》里的“询于刍荛”，《尚书》里的“谋及庶人”，都是远古原始民主的遗迹。到了后来，朝廷里会有几个谏官，懂得“舟水之论”，平时派人下去采风，体察民情，也算是一种戴着枷锁的“民主”。中国是这样，西方古代也有类似情况。

要追溯西方为什么后来超过中国，我看转折点是1215年（也就是南宋宁宗嘉定八年）。那一年英国的约翰王在贵族的逼迫下签定了《大宪章》，规定国王未经贵族会议同意不能自己征税，不能随意逮捕、没收财产和处罚人等。此举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这个贵族会议后来就演变成了国会，从此，在国王的身边有了一个约束他的机构，令他好不舒服，但也帮他减少了胡作非为，实际上对他和王族有利。

到了 1688 年，英国发生了史称“光荣革命”的大事件，公布了《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者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英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法治的国家。此举的背景是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了，他们最痛恨国王和贵族随便征税，妨碍商品自由流通，也最担心国王和贵族来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为他们鼓与呼的启蒙主义者康德说：“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民主就是人为自己作主。他说的“人”似乎泛指所有人，实际上当时主要是指有钱人。

光荣革命后 88 年，世界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美国独立。在美洲土地上已经富起来的农场主和商人，开始争取同本土上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但一再受阻，而他们的税赋却日见增加。于是，他们决定，既然成不了一个平等的英国人，就争取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当一个美国人。所以，虽然美国独立也属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但有人称之为“富人的革命”。这批富人继承欧洲的民主传统，在这片新大陆上，大胆尝试没有国王的新治理模式，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采用了多党议会民主的共和体制。当年那些开国元老在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不是民主，而是担心一旦议会里真的进来一大批代表穷人的议员，凭他们的多数票通过议案来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产，那该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投票权只给有财产的人，穷人是没有份儿的。顺便说一句，有人讨厌革命，说改良多好，麦克里兰对此评论说：“美国《独立宣言》已经指出，大多数时候，

大多数人宁可忍受有缺陷的政府制度，也不愿拉倒，冒险另建一个新体制。事情必定是糟得相当不堪，造反才成为一个理性地选择。”

再说说法国。它走的是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攻打巴士底狱，许多人在断头台上丧命。从 1789 年到 1815 年这短短的 26 年中，法国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罗伯斯庇尔式的“美德专制”、寡头执政团，接着又出现了拿破仑登基为“现代皇帝”，而 1815 年君主制又复辟了……后人感叹，民主好是好，但如果民主带来了混乱，最不民主的人就会登台收拾残局，而拿破仑执行的政策却在实际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段历史的奥妙与吊诡足够后人细细回味，迄今没有定论。

粗线条地回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些历史，可以感悟到，历史的进步不是哼哼民主小夜曲轻轻松松地走过来的，民主有时同暴力联系得很紧。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宪法并没有写明各州有没有退出联邦的权利，伯特兰·罗素（1872—1970 年）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各州有退出联邦的权利吗？那谁也不知道，只有北军的胜利才解决了这个法律问题。”同样，美国独立合法吗？按英国的法律当然不合法。美国人却用枪杆子告诉英国人：我是合法的！

等到资本主义挣脱了封建主义成长起来后，新的情况发生了，原来被掩盖的问题尖锐起来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一方面有实业巨头，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工人。民主制度的这种内在分裂，民主国家里的一般老百姓尚未认识到，但是这